

# 恪守诚信时的“守经达权”

原魁社

(1.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 晋城 048000 2.上海大学社会科学院 上海 200444)

【内容摘要】诚信与其他道德规则是相互关联的,但各种道德规范在不同境况下又是能区分出轻重缓急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恪守诚信时要做到既坚持原则,又能变通。但为了假仁假义而违背诚信规则是不可原谅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不诚信行为的监督和约束。

【关键词】诚信 守经 达权

中图分类号 B82-0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7-0130-02

《孟子》中记载过这样一段话:“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在这里,孟子认为“礼”是不能违背的,但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要权衡的,否则“是豺狼也”。在这个对话里,孟亚圣已经给我们讲清楚了“经”和“权”的关系。经:正道,原则;权:权宜,变通。形容坚持原则而能变通、不固执。“经是永恒不变的道德原理,权是适宜地解释经在不同的道德情况下所彰显着的具体义蕴,而作出正当合宜的道德判断与实质的道德选择。”<sup>[1](P231)</sup>恪守诚信时的“守经达权”指的是道德主体在面对诚信与其他道德规则的冲突以及诚信与道德主体自身利益的冲突时应如何做出选择。如果道德主体能够主动地选择遵从诚信的道德规则的要求,那么恪守诚信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但现实生活是非常复杂的,道德主体往往面临着两难选择,其内心要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诚信以达到其他目的。

## 一、诚信与其他道德规则的关系

我们传统道德的主要架构是“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规范,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补充而不能孤立存在的。《中庸》讲“诚者,择善而固执者”,讲以仁立诚,以义立信。“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荀子·不苟》)“信者,不负其心;义者,不虚设其事。”(汉·刘向)这说明诚信和仁义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一致,也有发生冲突的时候,这就要求道德主体就多种道德规范进行取舍,做出合理的选择。要谈诚信与其他道德规则的关系,就不能不谈及三纲五常说的提出者、汉武帝时期最著名的思想家董

仲舒。“仁、义、礼、智、信”这五个道德范畴,先秦思想家已经有过不少论述,但把它们明确概括为伦理学上“五常”的却是董仲舒:“夫仁、谊(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王者修饬,故受天之畀,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仁、义、礼、智、信”是传统社会的“五常”,即传统社会人们必须遵守的五种最起码的道德规则,在先秦儒家的学说中,“仁、义、礼、智、信”还只是五种不同的道德范畴,经过董仲舒的神学唯心主义的阐释之后,“仁、义、礼、智、信”从此被称作“五常”,与“天”联系在一起,并且“天不变,道亦不变”。但这五种不同的道德范畴并没有相同的地位,就“五常”具体内容和它们的关系而论,董仲舒和孔孟一样,是以“仁”为中心的。如果说孔孟的伦理学说以“仁”为出发点,荀子的伦理学说以“礼”为出发点,那么董仲舒的伦理学说是以“天”为出发点。“天”的观念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占着主导地位,他赋予“天”以至高无上的神的性质,认为人的形体、本质是由“天”决定的,人间的道德准则是“天”规定的。他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他认为人的各种道德属性天都具备:“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是有信的:“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春秋繁露·天容》)但是,“仁”才是天最根本的性格:“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

\* 本文为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课题,“诚信约束体系建构研究”课题名称。

\* 作者简介:原魁社(1977-),山西晋城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上海大学社会科学院在读博士。

穷极之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之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春秋繁露·俞序》)程颢、程颐将“仁、义、礼、智、信”发展为“五常全体四支”说,即“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意思是说,如果把“仁”看作是整个人体,“义礼智信”则是身体的四肢。朱熹则提出“仁包四德”的著名论断。这些思想家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传统道德的主要架构中,信的地位是比较靠后的,尤其是在“仁、义”之后。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孟子关于大人的论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孟子的话要求我们在诚信与“义”发生冲突时,要做到放弃诚信,即“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大义”。比如银行职工在特定的危险面前,你能对想抢劫银行的犯罪分子真实地说出保险柜的密码吗?还有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善意的谎言”。在这些特定的场景中,道德主体之所以违背了诚信,是因为有更重要的道德规范需要去遵守,我们不应过于谴责。但在现实中,却有太多的人打着“仁义”的旗号,肆意践踏诚信,“善意的谎言”一经被滥用,就变成了假仁假义,这样对诚信的道德规则的违背就不可原谅了。

## 二、道德主体面临的自身利益与诚信道德规则的权衡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sup>[2](P82)</sup>

市场经济是靠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这看不见的“手”之所以能够调节生产和分配,就是因为它引导着人们的利益取向。如果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从利他的角度出发想问题和做事情,那么,价值规律只能是一纸空文,无法起到作用。但现实是市场经济运行是顺畅的,价值规律是客观起作用而不可违背的,这也说明人们争取自身的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当追逐自身利益成为思维定势时,特别是不断地追逐自身利益成为唯一的思维方式时,主体自身的幸福就成为自己所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其他的一切的一切,都成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恪守诚信与主体暂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主体很可能会选择先实现自己当下的利益而不惜违背诚信规则。

功利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边沁说:“功利原则指的是当我们将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换句话说,就是以该行为增进或违反当事者的幸福为准……这些行为不仅要包括个人的每一个行为,而且也要包括政府的每一种设施。”<sup>[3](P211-212)</sup>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条原则被相当多的人所认同,但在实际的行为中,他们又往往把追求的目标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转移到行为人,即“当事者”的最大幸福。站在这样的功利主义的视野下看待是否应该遵守诚信规则的问题,那就是要看选择诚信是否最大限度地增进了行为人所认为的幸福,如果是,那么遵守诚信就不成为问题,如果不是,那么行为人就很可能以违背诚信来换取自身暂时的利益与幸福。周正龙拍出纸质的华南虎,其本人当然知道是假的,甚至帮助他用电脑处理图像的人员以及相关的官员都知道是假的,可是他们依然要大言不惭地坚挺着,甚至信誓旦旦地拿脑袋做担保,大有“不见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架势。华南虎事件的结果是周正龙被判了个缓刑可以住在家里服刑,在家服刑期间盖

起了本村最豪华的小洋楼。在这场“雷”倒中国人民的造假事件中,周正龙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周正龙,这个原本人们眼中老实巴交的农民兄弟,在面对自身利益与恪守诚信的博弈中,着实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警钟再一次敲响,如果没有对不诚信行为严格的监管和严厉的惩罚,如果不提高不诚信行为的成本,那么对诚信品质的号召和宣传只能流于口头的形式,那种弄虚作假的不诚信行为也会越来越变本加厉。

## 三、恪守诚信时的“守经达权”与制度规范

为了大仁大义而在恪守诚信时的灵活变通,不仅是道德规则允许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自由裁量权往往被滥用。特别是在权衡自身利益与恪守诚信时选择了自身利益而放弃诚信,从而造成对社会群体利益的损害。对于这种行为,必须加强制度的建设,缩小道德主体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并加大处罚的力度,对于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形成威慑。“社会制度是一套套的规则,这些规则以特定的方式构建社会互动。……制度通过如下两个机制,来共同构建社会互动和保证行为人遵守规则:(1)提供关于其他行为人选择的信息;(2)其他行为人对不遵守规则给予制裁的威胁。”<sup>[4](P56)</sup>在三鹿奶粉事件后,它的前董事长对记者承认,出事前他们在内部就检测出了问题。既然检测出了问题,为什么不及时公开?采取对公众隐瞒的做法,不就是担心会影响自己产品的市场吗?食品安全对民众来说是天大的事,但他们对对自己利润的关心胜过了对民众健康的关心,实在是丧尽天良。尽管有关人员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类似的事件依然经常发生。这些事件不仅暴露出了我们社会存在的诚信危机,而且也暴露出我们制度建设的滞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在客观上给丧尽天良的人创造了机会。亚里士多德说:“这些人,在天性上就是不顾羞耻,只知道恐惧。他们避开邪恶并不是由于羞耻,而是由于惩罚。”<sup>[5](P229)</sup>亚氏进一步指出:“对于那些天性卑劣的人,要用惩罚使他们服从。”<sup>[5](P230)</sup>因此,建设严格的制度体系,使得行为主体除了遵守诚信规则以外没有更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不仅要坚决杜绝违背规则的人获得额外的利益,而且还要让他们受到惩罚而遭受严重的损失。“如果遵守制度不会给他们带来比不遵守的情况下更大利益的话,那么自利的行为主体就不会遵守社会制度。”<sup>[4](P39)</sup>当然,制度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权衡各方面的利益,要在“既加强约束和监督,又要给道德主体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之间找到均衡点。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打造诚信体系、建设诚信社会依然任重道远。

## 参考文献:

- [1]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M].三联书店,1989.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3]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4][美]杰克·奈特.制度与社会冲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5]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